

中国
古代文论
的
生命化批评

袁文丽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袁文丽
著

中国古代文论

的生命化批评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化批评/袁文丽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668 - 1578 - 1

I. ①中… II. ①袁…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论—文学研究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5675 号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化批评

ZHONGGUO GUDAI WENLUN DE SHENGMINGHUA PIPING
著 者: 袁文丽

出版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崔军亚

责任编辑: 崔军亚

责任校对: 周优绚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05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将文学批评的话语“生命化”，即将作品参照人的生命形态，给予相应的比照作出“人化”式的评语，如风骨、筋骨、气血、主脑、文眼、文气、血肉、皮毛等。这种“人化”式的评语自然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古人还将山川大地的自然之理与文章的产生和内部结构相比拟，有时还将所使用的器物工具与文章的组织结构相比拟，从而创造出非常形象并带有生命质感的批评话语。“生命化批评”正是探究中国古代文论思维方式和民族特征的最佳切口。

袁文丽此书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键，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化批评做了一个全面整体的研究。她对中国古代文论生命化批评范式的具体内容和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追溯了其形成的哲学及文化学的渊源，同时结合个案分析对其包孕的义理内涵作了深入的阐释。对于生命化批评所体现出来的思维特征和言说方式，此书将其作为重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揭示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生命化表达方式与民族思维方式的紧密关系，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种表达方式形成的真正来源。当然，此书对生命化批评在当代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延伸性探讨，从而使生命化批评命题的研究具有了现实感和针对性。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如何在当代被赋予生命活力，一直以来都是古文论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古文论界开过不少次学术会议，论文与著作也发表出版了不少，不少学者也力图能有所突破。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媒体、全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文艺作品的形式花样繁多，评价话语与评价标准早就多样

化，如何继承与弘扬民族文论的精华，使其在今日的评论话语中还能起效用，的确是需要用心思的。但民族文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乃至灵魂在当代文论中还是会体现出来的。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就因为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并不会因为时间长河的流动而消失，而是会成为文化血脉中的成分，流动在我们民族文化之中。生命化批评的精神与思维方式，在我们当今的批评话语中还会体现出来。这或许正是我们研究与探讨生命化批评的指向所在。知以往是为了通向未来。袁文丽此书之所以需要出版而让更多读者知道，正是出于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文艺发展现实的需要。

袁文丽此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并不断完善而最终完成的，这项成果代表了她前一段的研究心得，也是她立志深挖一口学术之井的最初收获。依托这一学术基础，她会将学术研究的视角加以扩大与延伸。衷心祝愿她在学术道路上一帆风顺，取得更为满意的收获。

蒋述卓

2016年3月23日于暨南园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生命化批评形成的渊源	18
第一节 生命化批评形成的哲学渊源	18
第二节 生命化批评形成的人类文化学渊源	37
第三节 生命化批评的文学实践渊源	69
第二章 生命化批评的发展和理论形态	85
第一节 生命化批评的发展和成熟	86
第二节 生命化批评的阻隔与新变	113
第三章 生命化批评的思维特征和言说方式	130
第一节 整体综合型思维与古代文论的表达特性	131
第二节 辩证圆融的思维与表达特性	143
第三节 直觉体悟型思维与表达特性	158
第四节 意象思维特征与表达特性	179

第四章 生命化批评的特性与当代意义	193
第一节 生命化批评的特性	193
第二节 生命化批评的当代意义	203
结语	212
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30

绪 论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下，宇宙世界呈现出万物同构的泛联系性，展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圆满流转的生命整体之美。古代的文论家对作品进行审美评价时，总是不自觉地把文学作品当作一种整体的生命形式，用自我主体的生命体验与文学作品进行相互感发、对话、交流、交融，激发出生命的共振。在进行理论的总结和言说时，文论家们又用天地万物神人一体所体现出的生命规律和有机整体性来观照艺术作品，比类艺术理论。简而言之，传统文论把文学批评的对象视为有生命力的，是活的，因此，对作品进行批评也应该参照生命的形态，批评的法则也应该具有生命形态的意味，应该是具有生命力的，是活的。笔者姑且把这种批评范式称为“生命化批评”，即将“生命”作为“美”的范式来参照和评论文学。而所谓“范式”，就是指具有典范性或者经典性的方式。“生命化批评”被历代众多的批评家所沿用，既有典范性，又有经典性。

古代文论“生命化”的提法早已有之，如钱钟书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①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相继对这一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探讨，并把这种人、文同构同态的批评理念和范式称为“生命化批评”。学界大

^① 钱钟书. 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J]. 文学杂志, 1937 (4).

都喜好把“生命之喻”^① 的焦点聚集在“天、地、人”三才的“人”之上，其实质就是指向“人”喻或“人”化批评。然而，本文所要阐释、述说的“生命化”并不仅仅局限于“人”这一高级生命形式，其理论根基是中国古代的大宇宙生命哲学观，是“天、地、人”一体的生命整体观，因此，毋宁说这是一种“泛生命化”批评或“大宇宙生命化”批评。蒲震元在《“人化”批评与“泛宇宙生命化”批评——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模式中的两种重要批评形态》^② 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称之为一种以艺术为大宇宙生命外化形态的“圆览”或“圆形批评”。

“生命化批评”范式立足于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这一方面体现为不断变化、发展、生长的生生品格。《周易》提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把“天地”（宇宙、自然界）的变化与生命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认为生命存在于天地永恒的变化运动中，整个宇宙的存在就是一股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流”。另一方面表现为“万物一体”“混一不分”，并体现“自然之道”的和谐整体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一”是未分阴阳的混沌之气，它由道化生，并化生万物。《周易》提出相同的观点：“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朱熹对此作出了更明确的阐释：“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退处便是阴，长处便是阳，消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之消长，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也。”（《朱子语类》卷七十四）在中国古代的哲人看来，宇宙万物是一个大生机世界，气化氤氲，流衍不绝，体现出一派“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和谐灵动之美。正如方东美所说：“这个世界绝不是一个干枯的世界，而是一切万物含生，浩荡不竭，全体神光焕发，耀露不已，形成交光相纲、流

① 吴承学最早在《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中提出这一观点。

② 蒲震元.“人化”批评与“泛宇宙生命化”批评——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模式中的两种重要批评形态 [J]. 文学评论, 2006 (5).

衍互润的一个‘大生机’世界，所以尽可以洗涤一切污浊，提升一切低俗，促使一切整体生命深契大化生命而浩然同流，共体致美，这实为人类哲学与诗境中最高的上胜义。”^①

不同于东方的生命观念，柏格森把生命区分为植物、动物、人三种不同形态，此外皆属于无机物，是与生命不同的“惰性”的“物质”。而在中国古人看来，不仅人是有生命的，与人的生命存在、发展不能分离的万物也是有生命的。从古代哲学的层面上看，生命是一种精神（此精神，不是言其观念，而是就本体和真实而言）。朱良志对此作出了精辟论断：中国哲学认为，这个世界是“活”的，无论你看起来活的东西，还是看起来不活的东西，都有一种“活”的精神在。天地以“生”为精神。因为“活”，世界即联系。不“活”，世界即枯竭，生命即断流。中国人以生命概括天地的本性，天地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有生命，都具有生命形态，而且具有活力。^② 中国艺术都在“颂扬宇宙永恒而神奇的生命精神，就是这种宇宙生意，促使一切万物含生，百化光焉。中国艺术家正因能参赞化育，与此宇宙生命浑然同体，浩然同流，所以能昂然不朽于美的乐园之中”^③。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本是描述古代圣人取象的两途，在此笔者借来说明生命化批评的两种方式。“近取诸身”是从人本身出发，以人自身之理来观照艺术之理。纵观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许多审美概念，如风骨、气韵、形神、文气、主脑、诗眼、肌理、血脉、血肉、眉目、筋骨、皮毛等，评论中所用肥、瘦、病、弱等术语，都把文学作品及创作的过程视为与人同形同构：文学的构成，具有和人一样的生命模式；文学的体性，充溢着灵动的生命力；文学的风格，和人一样各具风韵。“人化”的内容

^① 方东美. 中国人的艺术理想 [A] // 方东美文集. 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5. 438.

^② 朱良志.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序言.

^③ 蒋国保. 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 [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2. 373.

大致包括三层：以人体为喻；以人的精神气质为喻；以人的社会关系为喻，包括人与人或人与物的关系，人的社会经验、社会活动、伦理关系等。第一层是形而下的，后两层是形而上的。“远取诸物”则是相对于人之外的宇宙自然之物，是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仰观俯察的方式总结得来的事物及其生生运行之理。相对于“人化”，姑且称之为“生命泛化”，其内容大致包括：形而下的自然事物本身，如动物、植物、四时、风雨雷电等；形而上的自然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规律，亦包括其体现出的“自然之道”对文学创作与审美评价的渗透、启示。文艺家们往往从宇宙自然的生命节律得到启发和熏陶，从而成就艺术美和总结艺术创作规律。唐代李阳冰言“学书之得力，不徒在书也，于山川天地，可以得方圆流峙之形”；元代戴表元在《许长卿诗序》中提出“风云月露，虫鱼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托于诸物，各不胜其为迹也，而善诗者用之，能使之无迹”，这些都要求“化天地而用之”，能够将宇宙万物用之为情，为情所用，演化为对生命意味的体会。清代石涛《画语录》论绘画技法的多样性源自画家对山川万物（宇宙生命）形态多样性的深刻体察：“山川万物之具体，有反有正……有虚有实，有断有连，有层次，有剥落，有丰致，有缥缈，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万物之荐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苟非其然，焉能使笔墨之下，有胎有骨，有开有合，有体有用，有形有势，有拱有立，有蹲有跳，有潜伏，有冲霄……一一尽其灵而足其神！”^① 这就是一种在技法批评中观宇宙生命与艺术生命会通的批评。沈德潜亦说：“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② 山川万物自然而然，因其自然性的充分展示而近于道，故以自然之道为本体的文章以山川

① 石涛. 笔墨章第五 [A] //石涛. 画语录.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4.

② 沈德潜. 说诗晄语 [A] //申骏. 中国历代诗话词话选粹 (下).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99. 91.

万物之自然性来标举艺术的创作与风格就顺理成章了。

生命化这种古老的批评观念与西方的某些理论有暗合或相似之处，这对我们研究古代文论的生命化批评会有巨大的启发。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已提出文学作品结构有机统一的思想。而黑格尔则以“生气灌注”来表述美与人的心灵的联系。西方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理论》第四讲中，对生命与美和艺术的关系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论述，她指出：

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这里所说的生命结构，包括从低级生物的生命结构到人类情感和人类本性这样一些高级复杂的生命结构（情感和人性正是那些最高级的艺术所传达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相似性，才使得一幅画，一支歌或一首诗与一件普通的事物区别开来——使它们看上去像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使它看上去像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用机械的方法制造出来的。^①

苏珊·朗格认为人类生命形式的基本特征是能动性、统一性、有机性、节奏性和不断成长性。艺术形式要成为“生命的形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必须是动力的形式；二，其结构是有机的整体结构；三，整个结构都是由有节奏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四，具有生命形式辩证发展的特殊规律。生命形式的这一特点，在任何一个优秀的艺术品种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苏珊·朗格的论述中实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艺术品是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其中每一个成分都不能离开整体，离开整体的成分必将失去意义；另一层意思是说艺术的内在结构呈现出一种有机形式，各构成要素之间，加一定的风格与一定的材料选择，一定的情节内容与一定的音韵、节奏的安排，一定的韵

^① [美] 苏珊·朗格. 艺术问题 [M]. 滕守尧译.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70.

律与一定的和声配器等都有一种神圣的契合，这种契合既不可侵犯，也不能随意更换，就像一个生物体中的组织有排异性，违背了这种契合，生命形式便被打破，情感的表现便趋于消失。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从来就强调艺术作品的完整和统一，用有机性一词来比喻艺术创作的协调和准确。^①

苏珊·朗格从符号学的美学角度出发，指出艺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主客交融的“生命形式”，与中国古代文论建立在整体思维之上的生命化批评不谋而合。但实质上，仍像所有西方文艺批评家那样，其立论的根基是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割裂了内容与形式、人生与艺术的内在联系，生命形式只不过是朗格艺术形式理论阐发的参照系，在两者之间寻找符号以类艺术和生命的共性。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化批评，把生命和宇宙及人自身的存在联系起来，并且把宇宙及人自身的存在看作生命运动变化的表现（在此，生命实已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从一种更高的宇宙学、生命哲学的角度来考察生命和美与艺术的关系。在这里，文与人、艺术与生命也就达到了《庄子·齐物论》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的境界。

以上所涉猎的，是本书立论的基点，也是前两部分所必须阐释的大致内容。本书前两章均立足于生命化批评范式的具体内容和形态，第一章从横向的角度对生命化批评范式的渊源进行梳理，逐渐勾勒出生命化批评范式的大致形态；第二章从纵向的角度作了大致的爬梳，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生命化范畴为个案，阐释了生命化批评范式的义理内涵和生命精神。

然而，本书的“生命化”是一种泛生命化，依托于古代生生不息的大宇宙生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活的生命精神。在此基础上，本书第三章从另一层面拓宽了“生命化”批评的内涵，实质上是将这种具有生命特性的艺术精神化作了一种具体的表达方

^① 刘大基. 人类文化及生命形式——卡西勒 朗格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67~268.

式。从生命运动的本质来看，生命的最基本特征必然表现为有机统一性和节奏律动性；从生命作为一种有血有肉的感性生存方式来说，又表现为诗性体悟性和具象可感性。因而这种生命化的批评范式在不断的生成过程中，逐渐凝固或强化了一系列与之契合相应的具有强烈生命特征和生命精神的思维特征，即浑圆整观、辩证灵动、直觉体悟、意象符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贯穿着生命化批评方式的方方面面，而且渗透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言说话语和表述方式中，使得古代文论整体表现出生命化的思维特征并呈现出相应的表达方式。本书第三章“生命化的思维特征和言说方式”的撰写，并不囿于古代生命化批评范式的具体理论内容，而是面向所有古代文论；是立足于“生命”的视角，对古代文论“怎么说”的层面进行一种探讨。这种“生命化”的说法，并不是前两章所言及的具体内容上的“生命喻象化”，而是一种具有生命特性的生命精神，是由实而虚的生命精神内化在古代文论的言说体系中的话语特色。简单来说，前两章主要谈及“生命化”批评范式的具体内容，而第三章主要涉及贯穿在古代文论当中的生命化的言说形式。这也正是学界所疏于探讨的。目前研究者大都聚焦于古代文论的义理内涵，却很少有人能从表达方式和话语特色入手，对富有诗性特色的古代文论作一个系统的探讨，从而概括出古代文论富有民族特色的话语形式。

此外，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必然将视野涉及整个古代艺术理论领域。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艺术领域中各种艺术之间总是相互影响，艺术理论领域中的各种艺术理论之间亦相互渗透，古代文论同古代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理论之间亦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诗、书、舞、乐、画之间似乎本来就有一种亲缘关系，所谓诗、乐、舞“三者本于心”，“诗画同源”，“书画同体”素来是古人确信不疑的理论命题。因而鸟瞰整个艺术理论领域，生命化批评遍地开花。如李嗣真《书后品》云：“而钟、张筋骨有余，肌肉未赡，逸少加减太过，朱

粉无设。同夫披云睹日，芙蓉出水。”^①《佩文斋书画谱》引《唐人书评》说：“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②荆浩《笔法记》云：“凡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笔绝而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迹画不败谓之气。故知墨大质者失其体，色微者败正气，筋死者无肉，迹断者无筋，苟媚者无骨。”^③李笠翁曲话云：“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④我们的古代艺术理论家处处感觉到艺术与生命和文化血肉相连的关系，诚如宗白华所说“中国艺术是生命的艺术”^⑤，“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表现生命，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⑥。在中国古代美学里，艺术、审美、生命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化批评从更高的理论层次揭示了古代文论的本质特征，从生命化角度切入，拓宽了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它作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观念，具有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它遍及各类艺术样式。因而课题研究的本身具有深远的意义。笔者试图从生命的角度深入挖掘和剖析古代文论，对古代文论“说什么”和“怎么说”两方面，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加以文化阐释；以文化诗学和哲学两个视角作为支撑点，全面考察古代文学理论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化现象，在对“生命化”的把握中诠释古人的文论主张和人文意蕴。

① 黄简等. 历代书法论文选 [C].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135.

② 洪丕漠. 书论选读 [M].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8. 13.

③ 何志明等. 唐五代画论 [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254.

④ 李渔. 李笠翁曲话 [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7.

⑤ 宗白华. 美学散步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77.

⑥ 宗白华. 宗白华全集（第一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545.

二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文论界对中国当代文论“失语”症的探讨和争议，学者们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中华民族的国粹——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话题喟然成为学术的热点，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各种论文和专著也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然而，不同于以往学界对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研究和运用，学者们通常侧重于对通史的叙述和梳理，所持方法论基本建立在西方文论的形式逻辑上，对本民族文化特点置之不顾，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本土资源和气候格格不入。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受制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亟待研究者从文化角度去加以关注、激活和解读。从这一契机出发，在“文化诗学”大视野的观照下，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各种学科交叉融合于其中，比如人类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美学、宗教等，并且立足于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深入理论内部的体系、概念、范畴、方法论、哲学基础、文化渊源进行研究。如复旦大学 1999—2000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分别从原理、范畴、方法三个方面论述其内在体系和民族精神。袁济喜从人文追寻和精神价值的层面去阐释古代文论，分别写成专著《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①《中国古代文论精神》^②等。

文学活动的实质，是一种生命活动，而且是一种高级形式的生命活动。智慧的中国古人早已觉察到了文学与生命之间存在的种种微妙而又复杂的联系，在考察文学创作、作品风格及审美评价时，总是不由自主地从生命的角度观照文学作品。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常常把文学作品比作有生命之物，常以生命喻

① 袁济喜. 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② 袁济喜.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 [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文学。鸟瞰中国古代文论史，随处可见这种“生命之喻”的文论言说方式。如上所述，钱钟书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撰文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在《谈艺录》和《管锥编》等著作中还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敏泽在《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一卷“人化的审美评价”部分对钱先生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引用和论述，并提出“人化的审美评价，常常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看作是具有生机勃勃的人来要求”，它是“我国审美评价的一个最鲜明的民族特点”，这一特点“一直支配着后来的美学思想”。^①宗白华早在《美学散步》中就对生命化批评有着深刻的感悟，认为中国艺术是生命的艺术，其要义就在于表现宇宙的盎然生意，诗、乐、画、舞皆如此。宗白华的理论著作都贯穿着艺术生命理论的主题。

纵观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学界对古代文论的生命化批评特色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人”化或“人”喻之上。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一书认为：“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形式，都会使作为欣赏者的‘自我’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它同时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形式又是生命。观赏者对艺术形式的欣赏和观照，实质上是对我们自身灵魂与生命形式的领会。”^②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③一书对审美、文化和人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生命化批评有许多精彩论述。对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作系统、全面阐述的是朱良志的《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④一书。该书分为四编，即“生生之源”“生生为艺”“体证生生”“生生之韵”，分别对艺术生命精神的根源、在书画园林艺术中的体现，以及审美生命体验和相关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对“生命”阐释的蓝本是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即整体的宇宙生命观念，从生命理论的提炼到生命体悟的审美分析，处处体现出作者独到的见解和精

① 敏泽. 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一卷）[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512, 514.

② 滕守尧. 审美心理描述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16.

③ 成复旺. 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④ 朱良志.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